

特别转载

编者的话

乾嘉传统与20世纪的学术风气
中国语言研究的自主创新
论“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
——兼论汉语研究中的“犬马—鬼魅法则”

何九盈1

王 宁17

鲁国尧28

学术思想研究

作为语言文字学大师的启功先生
钟敬文的节日研究与全球化时期的节日问题

董 琨37

董晓萍48

民俗学研究

明清时期巫觋信仰与巫术仪式述论
试论数字民俗地图的理念和相关数据处理原则
以民间书写材料阐释“讨儿子”习俗
从民俗语汇到学术用语
——“萨满”的词源及概念界定

萧 放77

赖彦斌89

朱 霞100

色 音110

文字学研究

论“汉字起源”的具体所指
纳西东巴文六书概说
楷书字际关系考辨(一)
“也”“只”考辨

李运富120

喻遂生147

李国英163

何琳仪 房振三169

训诂学与语义研究

从月季、玫瑰、蔷薇的分辨看词典释义的一种缺陷
《汉语词汇》的贡献与词汇学的新进展
语言共性与词义训释
——以行走类动词的将来时用法为例
文化索义——训诂学解释语义的重要方法
词义演变新探
《〈夏书·五子之歌〉新释》读后
《孙诒让札述方言校语》笔记
敦煌写本《春秋经传集解》异文中同源通用现象研究

刘叔新179

张绍麒 张志毅187

石毓智193

朱小健199

赖祝船205

殷国光211

华学诚214

李 索222

音韵学研究

《切韵》音系构拟的根本出路
——韵书、韵文、韵图之间的折衷与平衡
论采用“散点多线式”框架构建和描写汉语语音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上)
真值注音音切与假性注音音切

周流溪239

张渭毅263

万献初302

博士生论坛

《说文同文》汇编本勘正
徐锴文字学思想初探
从“单字为训”看《毛诗故训传》与诗小序的关系
从大德通京号管窥近代北京前门票商与民俗

陈晓强315

林 安323

凌丽君333

周锦章342

学术简讯

“第二届启功书法国际研讨会”综述
《陆宗达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出版
北师大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举办民俗学专业系列学术讲座和讲学
《中国民俗史》入选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

354

356

357

359

附：英文提要

关于本辑采用陆宗达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文章的说明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征稿启事

360

374

375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

第三辑



商务印书馆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

第 三 辑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 编

商 務 印 書 館

2006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 第三辑/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

ISBN 978-7-100-05374-7

I. 民… II. 北… III. ①民俗学—研究—中国②汉语—语言学—研究 IV. K892 H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7686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MÍNSÚ DIǎNJÍ WÉNZÌ YANJIÚ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

第三辑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 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民族印刷厂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5374 - 7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787 × 1092 1/16

200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4

定价: 35.00 元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学术指导委员会

主 任： 季羨林

委员(音序排列)：

陈新雄	陈振寰	程毅中	傅熹年	郭锡良	江蓝生
金开诚	何九盈	李 强	鲁国尧	刘魁立	李学勤
陆学艺	裘锡圭	王邦维	赵 诚		

主 编： 王 宁

副主编： 董晓萍

编 务： 黄易青

编者的话

学术发展的历史,永远贯穿着一条一元形态与多元形态矛盾斗争起伏的主线。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是多元形态,汉武帝时董仲舒请“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是一元形态;今古文之争是多元形态;魏晋的玄学则是对独尊儒术的反动;东汉以来佛教传入,儒道释并存,所以有唐代的气象和宋代理学的发达以及学术思想的解放;宋以后程朱理学定于一尊,注明代学风的空疏;清代在学风上直承汉唐,所以有乾嘉之学的鼎盛;嘉庆以后只承其烈,少有新的营养,日渐式微;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西文化碰撞,各种学派的论争,既是百家争鸣的盛事,也成就了我们现在引以为自豪的一些国学大师……近几十年来不再造就国学大师,个中原因毋需多言矣。

在多元论中,一个时代的各种学说之间及各学派内部,又都存在着孰主孰辅的矛盾。在儒道释并存的年代,儒家以儒学为本,吸收佛学的营养以发展;释子则以佛学为本,吸收儒学的营养。如此,儒学仍为儒学,佛学仍为佛学。20世纪二三十年后,否定民族文化的主张占了上风,于是国学不复为国学矣。

新的世纪之交,中西文化再一次激烈碰撞,本是正常的现象,就像上一个世纪之交的文化碰撞。虽然历史一再显示多元形态与一元形态的优劣,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的辩证关系,但是碰撞的双方仍然可能重蹈历史循环之辙,“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不吸收历史的教训,特别是上一次的教训,则有可能要么保守占上风——在改革开放时代这种可能性极小,要么西化甚至全盘西化占上风,国学将彻底不复为国学矣。

“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新唐书·魏征传》)何九盈先生的《乾嘉传统与20世纪的学术风气》,不但总结了刚刚过去的传统与现代化之争中学术兴替的历史经验教训,还提出了学理、学风、学术品格这样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强调“实事求是”的学风,再次肯定“为学术而学术”这样一个求真的信仰,人类精神追求的境界。“植根民族的土壤,建设自信的学科。”(本刊“发刊辞”)王宁先生的《中国语言学的自主创新》与鲁国尧先生的《论“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二文,都强调自主的原则。王宁先生提出,辩证地认识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长短,坚持自主的原则,以走自主创新之路为本,以学习西方为辅,才能达到真正的创新,才能有与世界各国对话的话语权。鲁国尧先生则强调,研究中国的语言文字,必须以中国的历史文献为本,同时,

2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

文献考证与历史比较相结合,是为新“二重证据法”。上述三文,均系有强烈感受之后所发之作,是为当前的学术风气切脉之后开出的良方。虽非本刊首次发表,亦予郑重推荐。

目 录

特别转载

编者的话

- 乾嘉传统与 20 世纪的学术风气 何九盈 1
- 中国语言学研究的自主创新 王 宁 17
- 论“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
——兼论汉语研究中的“犬马—鬼魅法则” 鲁国尧 28

学术思想研究

- 作为语言文字学大师的启功先生 董 琨 37
- 钟敬文的节日研究与全球化时期的节日问题 董晓萍 48

民俗学研究

- 明清时期巫觋信仰与巫术仪式述论 萧 放 77
- 试论数字民俗地图的理念和相关数据处理原则 赖彦斌 89
- 以民间书写材料阐释“讨儿子”习俗 朱 霞 100
- 从民俗语汇到学术用语
——“萨满”的词源及概念界定 色 音 110

文字学研究

- 论“汉字起源”的具体所指 李运富 120
- 纳西东巴文六书概说 喻遂生 147
- 楷书字际关系考辨(一) 李国英 163
- “也”“只”考辨 何琳仪 房振三 169

训诂学与语义研究

- 从月季、玫瑰、蔷薇的分辨看词典释义的一种缺陷 刘叔新 179

2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

《汉语词汇》的贡献与词汇学的新进展	张绍麒	张志毅	187
语言共性与词义训释			
——以行走类动词的将来时用法为例	石毓智		193
文化索义——训诂学解释语义的重要方法	朱小健		199
词义演变新探	赖积船		205
《〈夏书·五子之歌〉新释》读后	殷国光		211
《孙诒让札迻方言校语》笺记	华学诚		214
敦煌写本《春秋经传集解》异文中同源通用现象研究	李 索		222

音韵学研究

《切韵》音系构拟的根本出路			
——韵书、韵文、韵图之间的折衷与平衡	周流溪		239
论采用“散点多线式”框架构建和描写汉语语音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上)			
.....	张渭毅		263
真值注音音切与假性注音音切	万献初		302

博士生论坛

《说文同文》汇编本勘正	陈晓强		315
徐锴文字学思想初探	林 安		323
从“单字为训”看《毛诗故训传》与诗小序的关系	凌丽君		333
从大德通京号管窥近代北京前门票商与民俗	周锦章		342

学术简讯

“第二届启功书法学国际研讨会”综述			354
《陆宗达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出版			356
北师大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举办民俗学专业系列学术讲座和讲学 ...			357
《中国民俗史》入选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			359
附:英文提要			360
关于本辑采用陆宗达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文章的说明			374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征稿启事			375

乾嘉传统与 20 世纪的学术风气

何 九 盈

提要： 学术风气是决定学术发展方向、决定学术命运的大事。乾嘉学风以“实事求是”、“为学术而学术，保持学术的独立”为特色。20 世纪初存在三大国学圈：以辛亥革命为背景的国学派，以章太炎为代表；以新文化运动为背景的新潮派，以胡适为代表；以清华国学研究院为背景的古今中西会通派，以王国维、梁启超为代表。章、王、梁、胡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受过乾嘉传统的熏陶，三大学术圈都为创建 20 世纪的新文化作出过独特的贡献，在不同程度上为发扬乾嘉传统作出过历史性的贡献。但在此后，20 世纪的学风受到传统的“泛政治化”的严重影响，反对纯学术、形式主义与华而不实的学风相随而生。20 世纪的国学研究给我们的基本经验和教训就是：学术研究必须实事求是，为学术而学术；贯通古今，融会中西。

关键词： 国学 乾嘉传统 学风

每一个勤于思考的人都会注意到：新旧世纪之交，不只是时间上历法上的交替，而是整个文化界、思想界、学术界都面临着新与旧的交替。

20 世纪的结束，意味着在过去看来某些天经地义的陈旧思想、陈旧观念也将随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而结束，学术上的许多是非要重新评价，学术史要重新改写。我们要发扬那些在学术史上具有永恒意义的优良传统，自觉地抵制那些阻碍学术发展、阻碍我们追求真理的不良学风。

学术风气是决定学术发展方向决定学术命运的大事。少数优秀人物的学术实践发展成为具有群体影响的学术风气甚至变为具有历史意义的传统，需要多方面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有三条：一是学术资源，二是学术品格，三是学术机缘。新材料的发现，新思潮的刺激，以具有生命活力的旧传统作为立足根基，这是资源问题；为学术而学术，及时提出新的重大与原创问题，勇于“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品格问题；明辨学术变革的潮流，营造优良的学术环境，这是机缘问题。具此三者，然后才能产生开风气的学术人物。他们用自己的著作为范例，影响启迪同时代的人和后来者。

学术风气问题,往往要经过几十年上百年的历史过程,才可以论定其盛衰之理,得失之由,利弊所在。我们现在要全面深入谈论 20 世纪的学术风气,可能条件还不十分成熟,但有些问题是比较明显的,而且学术界已有一些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提法,如 80 年代初有人提出“回到乾嘉学派去”^{〔1〕},90 年代初又有人提出“走出疑古时代”^{〔2〕},近些年出现了所谓“陈寅恪现象”(或称“陈寅恪热”)。这些学术动向促使我思考下面这个题目:乾嘉传统与 20 世纪的学术风气。

我们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学术传统,为什么要单单提出“乾嘉传统”来谈呢?因为,从时间上来说,这个传统离我们最近。乾嘉时代相当于 18 世纪上半期至 19 世纪上半期,其下限距今也不过一百多年。这是一个真正为学术而学术的时代,出现了一批专门学术家,他们对古代语言文字的研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有些巨著至今还是高等学校最基本的教学用书。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就是周予同指出的:“现代学者都曾受到乾嘉学派的影响。”^{〔3〕}他所说的“现代学者”应是指 20 世纪第一代学人章炳麟、梁启超、王国维、刘师培等,第二代学人胡适、杨树达、黄侃、钱穆等,第三代学人中真正了解乾嘉传统的人就不多了。从 50 年代以后,乾嘉传统一直处于被否定的地位,一提乾嘉传统就联想到烦琐考据,尤其是年轻人,对考据有一种情绪上的反感、厌恶。1980 年王力先生在一次讲话中强调指出:

能不能因为乾嘉学派太古老了我们就不要继承了呢?决不能。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乾嘉学派必须继承。特别是对古代汉语的研究,乾嘉学派的著作是宝贵的文化遗产。段王之学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永放光辉。他们发明的科学方法,直到今天还是适用的。^{〔4〕}

但是,“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我们把乾嘉传统的命运与 20 世纪的学术风气联系起来考察,就会发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一百年之中,起码有八十年的历史页页都写着三个大字:反传统。有主张废汉语废汉文的时髦文人,也有主张把线装书丢在茅厕里三十年的民国元老,有“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也有交白卷不以为耻的“革命小将”。五千年的文明史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 20 世纪这样,一心要摧毁自己的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如此自己动手横扫自己的传统。有功利的驱动,也有野心的驱动,反正“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谁都可以“以革命的名义”革这传统妈妈的命。

〔1〕 王元化《思辨随笔》,第 161 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 年。

〔2〕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 年。

〔3〕 《学术集林》卷八,第 76 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年。

〔4〕 《王力文集》第 16 卷,第 78 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 年。

然而,传统是复杂的,如何对待传统就更为复杂。中国学术界几乎用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来解决传统与现代化的问题,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经验,在世纪之初就形成了多元化的学术风气。

一 20 世纪前期的三大国学圈

所谓三大国学圈,是就其学术业绩和与乾嘉传统的关系来界定的,不能理解为圈外无圈,圈外无学术。马克思主义属于指导思想,属于思想史的范围,不能降低为一个学术圈来讨论,我认为这是常识范围以内的问题。我所说的三大国学圈,是以辛亥革命为背景的国学派,以章太炎为代表;以新文化运动为背景的新潮派,以胡适为代表;以清华国学研究院为背景的古今中西会通派,以王国维、梁启超为代表。国学研究院(1925—1929)存在的时间并不长,有不少主张中西会通的学人如蔡元培、钱穆等与国学研究院无关,王梁二人也不是任职清华以后才主张中西会通的,所谓“以清华国学研究院为背景”只具有象征意义,在理解上不必太拘泥。二三十年代颇有影响的“学衡”派,就其反新文化运动而言,与章黄颇为接近;就其主张“昌明国粹,融化新知”而论^{〔5〕},又与会通派相亲近。“然议论芜杂,旗鼓殊不相称。”^{〔6〕}学术上卓有建树的也只有一个汤用彤。

三大学术圈都为创建 20 世纪的新文化作出过独特的贡献。他们都不尊孔,不尊经,都主张学术要独立自由发展,对乾嘉传统基本上都持肯定态度,而如何对待新思潮、新材料、旧传统,态度不完全相同。章太炎是站在传统的立场上来看待西潮的,胡适是站在西化的立场来对待传统的,王国维是站在学术的立场上来看待古今中外的。章太炎严守正统派的立场,坚持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并不反对西学,只反对欧化主义,反对全盘西化。胡适也提倡整理国故,但有人说他的学问构成是“三分传统,七分洋货”。胡适到台湾后,还有人说他“是中国文化的叛徒”^{〔7〕}。1919 年,北大文科有“新潮”与“国故”之争,这是章与胡两大学术圈的一次正面交锋。章太炎本人并没有北大任教,但辛亥革命后“五四”运动之前,章门弟子曾是北大文科的主力军,其中紧跟章太炎能发扬章氏小学而且能量最大的是黄侃,与章太炎学术观点相同被黄侃尊之为师的刘师培也于 1917 年来北大任教。他们二位是《国故月刊》的总编辑,马叙伦、黄节是特别编辑。《新潮》的主将是傅斯年,还有顾颉刚、毛子水等人,他们是胡适的崇拜者。傅原本颇受黄侃的器重,顾、毛原本服膺章太炎的学说,后来都转向胡适。章黄不能及时调整自己的学术方

〔5〕《学衡杂志简章》语,1922 年。

〔6〕钱穆《国学概论》,第 347 页,商务印书馆,1997 年。

〔7〕梁实秋《胡适先生二三事》,台北《自由谈》第 23 卷第 11 期。

向,株守传统的学科分类,缺乏新的学识和新的理论体系,学理资源单调陈旧。胡适能写出令人耳目一新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章太炎只能用传统的方法作《齐物论释》。章黄都反对白话文,章还不相信出土的甲骨文,这就注定了他们要败给新潮派。1919年7月黄侃不得不离开北京大学,不久刘师培又去世,“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北大的国故派已溃不成军,而国故派在全国颇有影响,他们有很强的内聚力,在小学与经学这两个领域里有很强的优势,加之尊师重道,所以直到现在,章黄之学还是一个颇有影响的学术流派。

当年的“新”“故”之争,傅斯年们算是打了一个大胜仗,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地位,也张扬了北大学生爱好批评的学术风气。但胡适、傅斯年、毛子水等人的很多观点是相当片面的。胡适于1919年发表《新思潮的意义》,提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十六字方针。他要研究的“问题”大多是社会问题,他说的“学理”是杜威等人的实证主义。他认为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向来没有条理,没有头绪,没有系统”,如何“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总之,中国古代学术只是一堆没有生命力、没有学理系统的死材料。毛子水就更为偏激了。他说:

国故是过去的已死的东西,欧化是正在生长的东西;国故是杂乱无章的零碎智识,欧化是有系统的学术。这两个东西万万没有对等的道理。

因为我们中国民族,从前没有什么重要的事业,对于世界的文明,没有重大的贡献,所以我们的历史,亦就不见得有什么重要。……譬如一个得了奇病而死的人,是很没有用处的一个东西,却是经一个学问高深的医生,把他解剖起来,就可以得了病理上的好材料,就有很大的用处。我们中国的国故,就同这个死人一样。^{〔8〕}

文中说的“学问高深的医生”无疑是指胡适。这位胡医生的“整理国故”就是拿着西方文明的解剖刀来“解剖”已经死了的中国国故。毛子水否定了中国文明,进而否定东洋文明。他说:

东洋文明和西洋文明,怎么能够处于对等地位呢?一两和十五两成为一斤,这个一两和这个十五两,除同为加法中的一个相加的数目外,并没有对等的道理。现在西洋文明和东洋文明的比,何止十五和一的比呢!^{〔9〕}

〔8〕 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新潮》第1卷第5号,1919年。

〔9〕 毛子水《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订误”》,《新潮》第2卷第1号,1919年。

傅斯年很赞同毛子水的观点。他说：“研究国故有两种手段：一、整理国故，二、追摹国故。由前一说，是我所最佩服的……至于追摹国故，忘了理性，忘了自己，真所谓‘其愚不可及’了。”又说：“研究国故好像和输入新知当立于对待的地位，其实两件事的范围、分量、需要，是一和百的比例。”^{〔10〕}

一个食古不化，一个食洋不化，新潮派与国故派各有是非。史家对新潮派一味唱赞歌，这就不是以是非论学术，而是以成败论英雄了。新潮派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民族文化、东方文化，盲目崇拜欧美，今天看来很幼稚，在当年却有很大的蛊惑力。他们对国故派的批评也很不公正，缺乏学理上与事实上的根据，其水平跟大字报差不多。1928年，傅斯年作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为该机关刊物写了一篇《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文中对“国学”，对国学研究院，对章太炎的《文始》《新方言》全面否定。这时的章氏因不通时务，沉浮于新旧军阀之间，两次受到上海当局通缉。由于学术本身和政治方面的原因，当年的章黄之学不可能成为显学，只能由往年的中心退居边缘地位。从事纯学术研究的人为太炎先生惋惜，直到40年代还有人说：“昔太炎先生不理卜文，学林以为憾事。”^{〔11〕}以太炎的功底研究卜文，卜辞研究史上就不只“四堂”而应是“五堂”了。此论并非求备于一人。

“新”“故”之争是现代学术史的基本主题，也是任何一位有成就的学术家必须选择的立场。所谓选择，可以是非此即彼，也可以是亦此亦彼，不此不彼，于是就有了会通派。会通派是如何看待黄与胡的“新”“故”之争的呢？1939年，梁启超的学生陈寅恪的挚友曾任教于清华的杨树达，写过一篇短论《温故知新说》^{〔12〕}，对胡适与黄侃各打五十大板。文章说：“温故而不能知新，其病也庸。”“不温故而欲知新，其病也妄。”在杨氏心中这两句话是各有所指的，直到《积微翁回忆录》公开发表，我们才看到1939年7月12日有下列记载：

撰《温故知新说》，温故不能知新者谓黄侃；不温故而求知新者，谓胡适也。^{〔13〕}
一语中的，值得后来者深思。

作为会通派的代表人物王国维，1925年入清华之前，早已有“考古大师”之称。他重视旧传统，也重视新材料、新观念。跟国故派相比，他具有锐利的世界眼光；跟西化派相比，他有深厚的传统根基、学术素养。他对新旧之争、中西之争，都持批评态度。

〔10〕 傅斯年在毛文后面写的“附识”共六条。

〔11〕 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第225页。董彦堂复杨树达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12〕 此文收入《积微居小学述林》，中国科学院出版，1954年。

〔13〕 同〔11〕，第152页。

余正告天下：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

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14〕}

“输入学理”问题，王国维的见解也比胡适要成熟得多。他说：“西洋之思想之不能骤输入我中国，亦自然之势也。况中国之民固实际的而非理论的，即令一时输入，非与我中国固有之思想相化，绝不能保其势力。”^{〔15〕}所谓“相化”，就是会通，就是有机结合，这些符合学术进步规律的精辟见解，是肤浅灭裂的胡适之徒所不能道的。陈寅恪、冯友兰、杨树达、郭沫若以及后起的王力等人，所攻专业不同，“相化”的原则是一致的。这是中国传统学术走向现代化的唯一正确途径。

王国维的成功固然在于当新旧之争中西之争乱作一团时，他能保持哲学家的清醒头脑，捉住矛盾的焦点，也在于他有高超的学术品格，勇于拥抱新材料和新问题。陈寅恪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16〕}20世纪出土了那么多新材料，甲骨、简牍、卷轴……王国维都有研究，硕果累累，“几乎篇篇都有新发明”（梁启超语。转引自刘烜《王国维评传》，第354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而章黄却“未入流”，这又是王国维高出章黄之处。我注意到，喜欢研究新材料、新问题，这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给清华国学研究院造就的好学风。随着三校合并为西南联大，特别是50年代初院系调整，此种风气已“光被四表”。20世纪开风气的学术大师，只有王国维的学术地位乃众望所归，不存在什么争议。不论是因提倡白话文而“暴得大名”、“风靡一时”的胡适，还是胡适的学生以疑古著称的顾颉刚（顾在《悼王静安先生》中说：“（王氏）为中国学术界中惟一的重镇”），乃至文坛巨擘鲁迅、郭沫若，都对王国维的学术业绩有很高的评价。“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17〕}适之先生如是说。

“最有希望”的王国维，终其身只是个导师，而不是领袖。会通派一直未能处于主流学术地位。一是王国维、梁启超过早逝世；二是中国的学术总是不得不跟政治漂在一起。一个曾是保皇党，一个到了1923年还食五品俸，南书房行走，其号召力当然就远不如留美博士、可望竞选总统的胡适了。1949年以后，胡适派虽然失去了政治背景，且以

〔14〕 王国维《国学丛刊序》，1911年。

〔15〕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1905年。

〔16〕 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原载1930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本2分。

〔17〕 1922年8月28日胡适日记。

运动的方式在全国批判胡适,但学术风气一直向左向左,由疑古进而上升为薄古、非古,根本反对考据;学理输入由全面输入欧美转为全面输入苏联,传统学术仍然没有找到恰当的位置。这就很可以理解,80 年代有人提出“回到乾嘉学派去”,90 年代清华出身的李学勤提出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口号:“走出疑古时代”,接着出现了“陈寅恪热”。对此,余英时有一个解释:“通过对陈寅恪的研究,大陆学者似乎在认真地重新考虑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世界的定位问题,其意义也是深远而重大的。”^[18]疑古之风可以休矣(这不是说什么“古”都不能“疑”),乾嘉传统不能丢,这不应该再有什么可争议的吧。

二 章王梁胡等人与乾嘉传统

20 世纪几位开风气的大师章王梁胡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受过乾嘉传统的熏陶,又都在不同程度上为发扬乾嘉传统作出过历史性的贡献。

从道光初年开始,以戴震为首的乾嘉学派就受到种种责难、抨击。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完全用“派性”的卫道者的眼光衡量乾嘉诸老,他也击中了汉学的某些弊端,而学风很不好。他攻击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为“亘古未有之异端邪说”^[19],段玉裁“诞妄愚诬,绝不识世间有是非矣”^[20],又说“近世汉学家,……耳食门面语,惟务与宋儒立异为仇,颠倒迷妄,信口乱道。……但恃数卷驳杂断烂汉儒之言,黄吻少年皆议宿学,势必流于狂诞无忌惮”^[21]。中国的学术界历来很重视“经世致用”,宣布一种学术为无用之学,这是击败敌手的高招。方东树很懂得这一点。他说:

汉学诸人,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佐数百千条。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徒使人狂惑失守,不得所用。

(《汉学商兑》,第 39 页)

方氏的这些话,对热血青年、新学小生很有鼓动作用,加之社会风气的变化,实证学风由此江河日下。继宋学派之后,清末的今文学派,也“主人生实行,不主训诂考订,与乾嘉以来风尚绝异”^[22]。

[18] 《“陈寅恪热”的新收获》,广东《东方文化》1997 年第 1 期。

[19] 《汉学商兑》,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

[20] 《汉学商兑》,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

[21] 《汉学商兑》,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

[22]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 705 页,商务印书馆,1997 年。

梁启超说：“在此清学蜕分与衰落期中，有一人焉能为正统派大张其军者，曰：余杭章炳麟。”^{〔23〕}

所谓“正统”就是乾嘉传统。章太炎的《释戴》首次肯定了《孟子字义疏证》对清廷的批判意义。此后，戴震的学术受到广泛重视。刘师培、王国维、梁启超、胡适等都研究过戴震。1924年北京学术界还在安徽会馆举行了戴东原生日二百年纪念活动。梁启超认为：“《疏证》一书，字字精粹。综其内容，不外欲以‘情感哲学’代‘理性哲学’；就此点论之，乃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之思潮之本质绝相类。……戴震盖确有见于此，其志愿确欲为中国文化转一新方向；其哲学之立脚点，真可称二千年一大翻案；实三百年间最有价值之奇书也。”^{〔24〕}胡适认为戴是“三百年中数一数二的巨人”。从1943年起，胡适用了近20年的时间，重新研究所谓戴震剽窃赵一清《水经注》一案，阅读了60多种不同版本的《水经注》，写了上百万字的研究文稿，为戴震辩诬。^{〔25〕}

章、梁、胡都对乾嘉传统进行过系统总结。章太炎的《清儒》《学隐》对清代学术发展的背景、流派、特色作了简明扼要的剖析，表彰戴段二王之学，盛赞戴震“深通”小学、礼经、算术、舆地。他说：

凡戴学数家，分析条理，皆多密严，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与苏州诸学殊矣。

（《清儒》）

章氏还追踪惠戴心迹，故意以“学隐”倡导时人，“家有智慧，大湊于说经，亦以纾死。”“近世为朴学者，其善三：明征定保，远于欺诈；先难后得，远于徼幸；习劳思善，远于偷惰。故其学不应世尚，多悃悃寡尤之士也。”（《学隐》）

梁启超对乾嘉传统的评价比章炳麟的研究要深入开阔，如论“正统派之学风”有十点“特色”^{〔26〕}，论高邮王氏父子“用科学的研究法”治学，其方法有六（注意，虚己，立说，搜证，断案，推论）^{〔27〕}，都能示后人以轨则。

与章、王、梁三大师相比，胡适的古典训练、国学根底弗如远甚，而梁启超也称赞他“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28〕}。胡适于民八、九、十年，断断续续写成了《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认为：“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文章

〔23〕 《清代学术概论》28节，第157页，商务印书馆，1921年。

〔24〕 《清代学术概论》，第68页。

〔25〕 参阅方利山《胡适重申“〈水经注〉公案”浅议》，《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三联书店，1993年。

〔26〕 《清代学术概论》，第77页。

〔27〕 《清代学术概论》，第74页。

〔28〕 《清代学术概论》，第12页。

的结尾指出：戴震说的“但宜推求，勿为株守”（《与王内翰凤喈书》）^[29]，这“八个字是清学的真精神”。胡适的名言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他认为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总括起来，也是这两点。“推”就是假定，“求”就是求证。这样的比附不能说毫无道理，然二者毕竟有主观与客观之别。

现代学术对乾嘉传统的继承是很自觉的，也很有成就，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 以语言文字学为根基。戴震的治学方法是“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古经解诂序》）。他批评“宋已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贤圣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与某书》）。又说：“今人读书，尚未识字，辄目故训之学不足为。其究也，文字之鲜能通，妄谓通其语言；语言之鲜能通，妄谓通其心志。”（《尔雅注疏笺补序》）乾嘉学人研究文字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即使是方东树也不能不佩服。他说：“小学音韵是汉学诸公绝业，所谓此自是其胜场，安可与争锋者，平心而论，实为唐宋以来所未有。”^[30]作为语言文字大家的章炳麟、王国维，不仅继承了乾嘉语言文字学的成果，而且他们本人在语言文字学方面都做出过重大贡献，这是人所共知的。陈寅恪也受过严格的古典训练，他“能背诵十三经”^[31]，他的语言学论文如《四声三问》《东晋南朝之吴语》《从史实论切韵》，都有独到的见解。胡适读过九年私塾，在语言文字上也下过工夫，还发表过音韵、文字、训诂、语法方面的论文。研究中国学术文化，不了解乾嘉传统中的小学训诂成就，就很难与传统亲近。

2. 以考据为治学方法。乾嘉传统以考据为中坚。诚如梁启超所言：“夫无考证学则是无清学也。”^[32]章梁王胡等人都继承了这一方法。王国维成绩最为突出，清儒只从事书本上的考古，王国维创“二重证据法”，将考据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胡适的“考据癖”曾影响过整个学术界，他的《红楼梦考证》开创了“新红学派”，功不可没。胡适的考据手段是古典的，其考据理论是西洋的。他信奉杜威的“实验主义”，将实证过程分为五步：（1）疑难，（2）难点，（3）提出种种假定的方法，（4）选择最适用的一种假设，（5）证明。胡适说：“五步之中，最重要的就是第三步”，因为“杜威一系的哲学家论思想的作用，最注意‘假设’”。^[33]50年代以来，“考据”二字一直遭受鄙薄。不仅胡适的考据曾经被全盘否定，甚至认为“从乾嘉时代起，所谓考据家几乎都堕为统治阶级的婢女了”^[34]。这不是事实。还是梁启超的判断正确：

[29] 《戴东原集》，第37页，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

[30] 《汉学商兑》，第145页。

[31] 《清华汉学研究》第2辑，第316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

[32] 《清代学术概论》，第51页。

[33] 《胡适文存·实验主义》卷二，第127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6年。

[34] 周辅成《戴震》，第72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